



中國楚辭學

第九輯

中國屈原學會 編

學苑出版社

中國楚辭學

第九輯

中國屈原學會 編

學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楚辭學. 第9輯/中國屈原學會編.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077 - 2883 - 5

I. 中… II. 中… III. 楚辭 - 文學研究 - 中國 - 叢刊
IV. I207. 223 -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75835 號

出版發行: 學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2號院1號樓 100079

網 址: www. book001. com

電子信箱: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郵購電話: 010 - 67674055

銷售電話: 010 - 67675512 67602949 67678944

印 刷 廠: 北京通州京華印刷製版廠

開本印張: 880 × 1230 32 開本 10.5 印張

字 數: 2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數: 0001—1200 冊

定 價: 30.00 元

《中國楚辭學》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方 銘 周秉高

委 員 [韓國]安秉鈞 蔡靖泉 (中國臺灣)陳怡良

(中國澳門)鄧國光 方 銘 何念龍

郭建勛 郭 傑 黃鳳顯 黃靈庚

李大明 林家驪 劉毓慶

呂培成 [韓國]朴永煥 [日本]石川三佐男

湯漳平 姚小鷗 殷光熹 詹福瑞

張崇琛 張宏洪 趙敏俐 周秉高

《中國楚辭學》學術委員會

主 任 褚斌傑

委 員 張正明 崔富章 毛 慶 趙逵夫

蔣南華 潘嘯龍 周建忠 李 誠

徐志嘯 方 銘

編 務 馮 莉 胡宏哲 張 鶴 唐景珏

唐 元 牟 穎 杜亞輝 董秋月

徐 輝 王孝强

目 錄

從《九章》看屈原自沉前的復雜心態	劉麗華(1)
“楚辭”在漢代的傳播與接受	李中華(15)
漢武帝和楚辭的解讀與傳播	魯洪生 龍文玲(31)
從騷體賦看漢人對屈騷的接受和傳播	于浴賢(47)
漢代騷體賦文體功能的發展演變	孫 晶(62)
劉向與“九體”之騷	王以憲(76)
不同的評注,不同的評注者	
——以《楚辭章句》的多樣化評注	
為基礎試探本書的成書過程	[德國]白 馬(89)
北朝騷體文學概說	郭建勛(125)
唐代屈騷接受史論略	蔣 方(139)
屈原與中唐南貶士子的騷怨精神	翟滿桂(158)
論元曲家對屈原的評價	劉樹勝(171)
《楚辭集解》辯駁“屈原投水說”的	
理路分析	劉偉生(185)
何喬遠及其《釋騷》	(臺灣)陳偉舜(200)
直覺感悟:清代楚辭研究成型而杰出之法	毛 慶(218)
《離騷》戴氏注	郭全芝(231)
以情悟道	
——屈原對遊仙文學之影響論略	
(臺灣)蘇慧霜(243)	
藤野岩友“巫係文學論”評議	
——以“巫係文學表”為中心	
徐志嘯(265)	

伯禹復鯀與龍馬圖騰	黃震雲 (278)
楚辭、漢賦之巫技巫法綜探	李 倩 (294)
陸侃如先生的楚辭研究	王洲明 (316)

從《九章》看屈原自沉前的複雜心態

陝西師範大學 劉麗華

文學作品往往是作者自我心靈的表現。《楚辭》中屈原的全部作品，其實就是屈原的一部“心史”。他將自己最真摯的情感，最真誠的想法，都融入到這部“心史”之中，後世讀者通過它們可以來瞭解和推測屈原在不同時期的情感和心態。《九章》作為屈原的代表作之一，即使有的作品是否為其所作仍存在爭議，但這些作品能被作為一個整體流傳下來，就說明它們與屈原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可以在我們研究屈原的思想和心態時提供一些佐證。這九篇作品作於不同的時期，但大多是屈原晚年的作品，它們從不同角度流露出屈原對生、死的複雜情感及其心靈的掙扎與徘徊，為我們研究屈原提供了比較充足的材料。那麼，我們就從《九章》來看看屈子自沉前的複雜心態吧。

—

壯烈地死去還是苟且痛苦地活着，這是屈原自沉前頭腦中鬥爭最激烈的問題，也是他必須作出抉擇的一個問題。“死”具有嚴酷而又現實的意義，選擇了“死”，也就意味着人世間的一

切事物、現實中的任何快樂榮華都不再與之相關。“非死為難，處死為難”，^①當人們必須對“生”與“死”做出抉擇時，複雜而矛盾的心態是必然會出現的。人是一種極為現實的動物，都渴望與眷戀著“生”，這是一種強大的自然生物本能，屈原作為人類的普通一員，自然也不會例外。面對生死，屈原存在着極為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想效法前賢，以死來保持自己高潔的人格，以生命殉國，對死有一種自覺的選擇與追求；另一方面，他又在無意識當中處處流露出對生的眷戀與熱愛；另外，他對楚國的君王存在着深刻的怨望之情，這自然也會影響到他對生死的選擇。以下就從這三方面來敘述，希望能對屈原自沉前面對生死的複雜心態有一個整體而全面的把握。

(一)對“生”的熱愛與眷戀

儒家強調不朽，認為為人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這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充分發揚與肯定，強調人要有所作為。這一思想深深地影響着屈原。作為楚國的貴族之一，他渴望在政治舞臺上一展自己的才能，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他“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其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對功名事業有一種自覺的追求，這實際上是渴望將自己的生命力作最大化的彰顯，確證自己的價值所在的要求，這也是人在生存過程中的一種自然而強烈的追求。

① 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2002.50

但現實卻往往總是事與願違，“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群而贅疣”^①（《九章·惜誦》），“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九章·哀郢》），“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九章·惜往日》），在重重打擊下，他並沒有氣餒與妥協。在《九章》中，他屢屢表明自己的心志，“言與行其可跡兮，情與貌其不變”（《惜誦》），“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同上），“介渺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九章·悲回風》），希望自己能重新被重用，參與政事，報效國家，可見他是不願以死來解決痛苦的，況且，選擇了死，“恐壅君之不昭”、“恐壅君之不識”（《惜往日》），自己的清白、才志不為君王所明，又怎能輕易去死呢？

事實上，屈原是十分熱愛生命的，他吸食天地的精華：“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風》），“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離騷》）；渴望與神仙同游：“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九章·涉江》）；渴望長生：“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同上），對生命的讚賞之情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都是很短暫的，任何人都會珍惜這來之不易的一世輪回，屈原更是這樣。他渴望將生命的長度延長，將生命的密度加大，他努力在現實的世界有所作為之外，又在想象的世界中自由遨遊，與那些長生不老、永葆活力的神仙們同游、同食、同宿，在理念的世界中獲得生命與精神的永生，將生命的能量與活力發揮到最大限度。

① 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2002（以下《楚辭》選文未注明者均出自本書）

屈原十分注重修飾自己，無論是從外在的服飾上，還是從內在品格的修養上，他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騷》）。只有熱愛生命、珍重生命品質的人，才會這樣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來裝扮、提高自己。他用天地的精華來滋養生命：“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惜誦》）；他精心的修飾自己：“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涉江》）。高潔的品質是他從小到大、持之以恆的追求：“余既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涉江》）；長年的追求下，他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內厚質正兮，大人所勝”（《懷沙》），“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九章·懷沙》），“芬鬱鬱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九章·思美人》）。他熱愛並鍾情於這樣的生命，這樣的生活。《橘頌》作為《九章》中別具一格的作品，實際上就是屈原對自己精神追求、人格修養的一份宣言書，詩中對橘的種種美好品質的描述，也正是他內心的真誠嚮往。正是這種對高潔人格的自覺追求，對生命力的充分顯揚，生動地表明了屈原在本質上對生命的無限熱愛與眷戀。

（二）對“死”的選擇與追求

正如李澤厚在《華夏美學》中所講的，“他（屈原）的選擇（指自沉而死）是這樣的堅決、果斷、長久，它是自我意識的充分呈露，是一種理性的情感抉擇，而絕非一時的衝動或迷信的盲從”。^① 屈原是在慎重考慮與痛苦的反思中最終選擇了死，他可

^① 李澤厚．華夏美學．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146

以保全生命去享受生命中的快樂和奢華，可是現實的種種遭遇卻讓他寧願以自沉的方式來祭奠自己高潔的人格、摯愛的國家，也正是在這種壯烈的抉擇中，他的精神得到了高度的陞華。

屈原以忠貞之心，懷抱一腔熱血，希望能振興楚國，所得到的却是被疏遠、被譏毀、被流放的待遇：“吾宜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惜誦》），“衆踳踳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哀郢》）。在種種矛盾與痛苦中掙扎、徘徊的屈原將目光轉向了先賢，他看到了輔佐君王成就大業的伍子胥、勇於進諫的比干，而他們的遭遇又是什么呢：“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詩人那濃烈的情感再一次遭到打擊：“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惜往日》）。在現實與歷史的雙重時空下，屈原那失望、痛苦的心靈都得不到舒緩與排解，他該怎樣自處呢？歷史似乎給了他答案，他也依照歷史的指引做出了自己的抉擇：“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懷沙》），“獨瑯瑯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悲回風》）。

屈原不願被醜惡而黑暗的世俗同化，只能以死來保持他的貞潔，去殉自己高尚的志節。正如弗洛伊德所說：“如果我們自己必須去死，而且在死亡之時首先要失去我們最親愛的人，那麼，我們就比較容易服從一個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服從那個至高無上的‘必然性’（necessity），而不願選擇有可能避免的機遇”。^① 對於屈

^① 弗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弗洛伊德文集（6）．長春出版社，2004．33

原來說,與其拋棄美好的品質、降低人格,與世俗小人同流合污,他寧願選擇死:“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離騷》)。他寧肯愁苦終身也不肯改變自己的志節:“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涉江》),“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同上);他認為屈心向俗是為君子所鄙視的,也為自己所不能接受的:“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懷沙》),“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思美人》),“甯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同上)。屈原不願意放棄自己的高潔人格而去認同世俗的黑暗,但他又沒有別的辦法同這黑暗而又醜惡的現實完全決裂,這樣,屈原就陷入一種十分緊張的內在衝突之中,自殺也就成為他必然的選擇。^①

《哀郢》一詩,王夫之《楚辭通釋》即斷為頃襄王二十一年所作。另據郭沫若對屈原年齡的推算,屈原不可能在郢都淪亡前死去。郢都在詩人以及楚國人民的心目中是有著特殊意義的,它是國家政權的中心、民族精神的象徵,現在,它卻落入敵人手中,這樣的屈辱會在詩人心中引發怎樣的震撼與波瀾!詩人在哀、悲、憂、愁之中度日如年:“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哀郢》);他在極度鬱悶、悲傷之中茫然不知去往何方:“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所蹠”(同上),即使在睡夢之中,屈原也從未忘懷過為他所魂牽夢繞的楚都:“惟郢都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抽思》)。郢都已被攻破,岌岌可危的楚國又能堅持多久呢?忠貞

① 馮川. 死亡恐懼與創作衝動.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79

的屈原不忍看事態的發展，只能以死殉國。況且，對於死生之際、出處之分的界限十分清楚的屈原，在國都被攻破、君主逃亡的情況下，依然無法用自己的才情報效國家，匡救扶持君王，也唯有一死以反抗這黑暗而沒有希望的世界了。

（三）對君王的怨責與希冀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屈原十分看重君臣大義，他想要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則勢必要得到君王的支持和幫助。在屈原的心目中，真正的明君、哲王應該任用賢才，虛心聽取臣下的意見，務實而又奮發有為，且能夠明辨是非，不為小人讒言所惑，然而現實中的君王則恰恰與屈原理想中的君王形象大相徑庭：他親慕小人，卻憎惡忠心耿耿的臣子：“憎慍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哀郢》）；自驕自傲：“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抽思》）；聽信小人的讒言：“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惜往日》）。忠貞的屈原被無端棄逐到這蠻荒之地，這是他無法理解與接受的。他覺得自己的才情與忠貞是可以“指蒼天以為正”的，是可以“俾山川以備禦兮，命咎繇使聽直”的（《惜誦》）。在他心中，存在着強烈的疑問與不滿：“何貞臣之無辜兮，被離謗而見尤”、“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惜往日》）。在這種情況下，有志不得伸，有才不能用，一心為君王的屈原必然會對君王心存怨意。但是，另一方面，屈原又從未忘懷于君王，他依然保持着那種“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離騷》）的熱情與忠貞。他渴望得到君王的瞭解與信任，讓君王明白自己高潔的人格，明白自己專心為君而無它的忠貞之情，

明白自己想讓楚國更強大,使君王流芳百世的信念,所以他對君王的冀望之情也是十分濃厚的,屢屢寫詩以“自明”：“願寄言於浮雲兮”、“因歸鳥而致辭兮”(《思美人》),渴望通過恰當的媒介傳達自己對君王的思慕與眷懷之情。事實上,詩人對君王的希冀與愛慕之情往往總是在怨望的矛盾鬥爭中佔據主導地位。屈原在無意識當中似乎也在為君王的昏庸尋找著理由,他把君王的不明歸結為小人的阻礙：“獨障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惜往日》);奸小的蒙蔽：“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惜誦》)。也許,從這一複雜的心態出發,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他“恐壅君之不識”、“恐壅君之不昭”的矛盾敘述了吧!

二

屈原在自沉前矛盾而複雜的心態並沒有局限在生死之間,這雖然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但一旦得出了答案,也就意味著詩人心靈痛苦的最終解脫。詩人也沒有停留在對君王的怨望之上,因為在他的潛意識當中,他始終都在為君王奔波效力。最為痛苦而又始終旋繞於屈原心間的,是那些矛盾而猛烈的情感、心靈衝突,是交錯於屈原心中的超我與自我、困惑與警醒、情感與理智、渴望他人認同與獨立、獨醒的種種矛盾,這些複雜而又微妙的矛盾心態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痛苦而又偉大的屈原。

弗洛伊德將人分為本我、自我、超我三種精神狀態,三者是相互矛盾而又緊密聯繫的。自我有“趨利避害”的本能,而超我則需要在這種本能選擇中作出道德的評價,看其行為是否符合

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道義，這就產生了矛盾。屈原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一種絕世獨立、孤清不群的人格：“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橘頌》），然而，處於世俗社會中的屈原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系列問題與障礙來危及這種“超我”的實現：“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沙》）。是堅持理想品格還是屈心向俗，這是詩人內心的一種矛盾。屈原之偉大就在於他作出了這樣的抉擇：“寧赴湘流，葬於魚腹之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

屈原堅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是符合道義與為人的標準的。但是，現實的黑暗又讓他困惑於自己的抉擇。在詩人的內心深處，存在著兩種力量：一方面為了自身的利益與安全而離國他就或與小人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則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堅持自己的志向。在《惜誦》中，屈原將這種複雜而矛盾的心態表現得淋漓盡致：“欲儻偁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志堅而不忍”。屈原在痛苦的思考中對自己要走的路有着清醒的認識，在《卜居》中，他將這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擺在了自己以及世人的面前，在這鮮明而對立的衝突中，屈原以警醒的心態作出了鄭詹尹無法作出的決斷，即《卜居》等篇所說的：“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余將董道而不豫兮”（《涉江》）、“甯隱閔而壽考兮”（《思美人》）。

屈原的情感是濃烈而真摯的，他想以自己的才華來報效國家，將自己鮮活的生命投之于楚國這片土地，而現實的種種遭遇卻總是毫不留情地打擊詩人的熱情與嚮往。在《惜誦》中，占卜的“厲神”清楚而又明白地告訴屈原“君可思而不可恃。固眾口

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與打擊之後，詩人的理智清醒地告訴他什麼才是最好的選擇：“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悲回風》)。按照這一理智的思考，詩人無疑應該避害趨利，改變初衷，以免永處“終危獨以離異”之境，然而，詩人的情感卻不允許他作這樣的選擇——對君王的依戀、對朝政的熱望、對楚國興盛的期待，一直都是激勵詩人奮鬥不息的生命力量，在理智與情感的糾纏中，詩人的選擇最終讓位於情感。^①

屈原畢竟也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人，而不是神，他也渴望世俗的一切榮譽，他希望得到君王的重用、同僚的認可、大眾的理解與接納，但堅持高潔人品、不屈心向俗的他只能獨行、獨醒於茫茫人海之中，承擔著先覺者的痛苦。在《九章》中，他反復申訴著“莫吾知”、“莫知余”、“眾不知余”、“莫察余之中情”的悲哀與困苦，他其實大可以拋棄自己的品行“與世推移”，“淝其泥而揚其波……何不鋪其糟而歆其醢”(《漁父》)。但是，即使是那樣的痛苦與悲傷，他還是堅持自己的道路，堅持自己認同的道義。

三

屈源自沉前的心態是矛盾而複雜的，他渴望生的快樂，希望在生的過程中有所作為，但是，現實的種種因素卻又使他必然去

^① 潘嘯龍，蔣立甫．詩騷詩學與藝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03

選擇死；他既寄希望于君王，卻又深刻地瞭解君王的蒙昧而心有怨責。他心靈深處種種的矛盾與掙扎使他經常處於痛苦之間。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他面臨這樣的狀況呢？

（一）詩人的心態、性格與遭遇使然

屈原是一個感情極為濃烈的人，無論是對國家，對人民，還是對君王，他都是滿腔熱情，忠貞不渝，希望能有所助益。他希望楚國富強，在諸國林立的政治舞臺上佔有一席之地；作為楚之同姓，屈原對楚國在盡臣的義務的同時又有一種對宗族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他更加關心、關注楚國的發展與壯大。他對楚國人民充滿了同情與熱愛，郢都被攻破時，他首先想到的是“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即使是在痛苦中想一走了之時，又是人民將他的腳步留住“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至於屈原對於君王的複雜心態在上文已詳述，茲不贅言。總之，想要為國、為民、為君王盡忠盡力盡智的種種心態都讓屈原渴望與眷戀着生命。畢竟，有生命才有可能去實現這一切。另一方面，屈原在追求一種超世俗的人格的同时，又不能完全擺脫對現實世界的眷愛，他一方面堅決拒絕向現實妥協，另一方面，他對自己不被現實容納又懷有極大的痛苦。這種複雜的心態必定會使屈原頗受煎熬，在痛苦中掙扎。

屈原的性格又是十分執著的，儒家強調“道不行則藏”，又以中庸為美；道家強調泯滅善惡、異同，不去區別分辨這一切；而屈原則不同。“屈莊畢竟不同。其不同就在：對人際的是非、善